浅谈苏辛

高一（2）班 陈友涛

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

方学了课文，又在读《苏东坡传》，对于苏辛二人，自然也生发出一些感悟。虽同为豪放派词人，两人却相隔近百年，而百年时光，其间山河已全然不同。

既从课文谈及，便从课文入手，以谈谈两人之用典。苏轼在《念奴娇》中用的是周瑜之典故，在《江城子》中用的是魏尚之典故。二者何许人也？功臣。虽有大谋，虽晓兵法，说到底，还是臣子。这与苏轼自身的生平颇为类似，或更甚之，苏轼一生其实从未真正领兵打仗。由此其实可见，苏轼之报国，是之于个人层面的建功立业，与图百姓之安居乐业。而辛弃疾呢？刘玄德、孙仲谋、刘裕，皆是君王之典。且这些君王之典不同于一般诗人所意图求重用而用的善于选贤举能的君王，稼轩身为一介臣子，用的恰是胸怀大志、意平天下的君王典，可见其志向之非凡。由此而见之，辛弃疾之报国，是之于国家层面的北击胡马、收复失地的壮志。

单从此处看，似乎就臆断有苏子瞻不如辛稼轩。但若不结合时代背景就对人或事盖棺论定，未免有些囫囵吞枣的意味。

北宋与南宋，就某些方面而言，差之千里。北宋的江山，好歹还算安稳，百姓安定，并未到南宋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之境地。北方尚未沦陷，民无江南游子之思，是比南宋好了不止半点。再者，于二者个人的身世背景而言，苏轼终其一生不过一介书生，而辛弃疾却是金戈铁马后南下归宋的。打个比方，一出世就是作为装饰用的宝剑，不管它被打磨得有多锋利，与饮血沙场而后被高挂雪藏的吴钩，其处境与意味是全然不同的。面对北方的沦陷，朝廷的苟安，稼轩的心上以致词中多了一些悲，多了一点恨，而相较之的子瞻，则多了一些释，多了一点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的报国之志才会有所不同。辛弃疾心心念念的北伐，莫如说，正是当时百姓的愿望，是无数像他一样的江南游子最深切的期望。因此在辛弃疾任地方官时，对他的描述大都是“重视生产，训练军队，为北伐做好准备。”这样看似乎他并不在意人民，但其实，并不是他的眼中没有黎民百姓，而是他早已和百姓的眼光一同看向那北方影影绰绰的胡马。

而苏轼则大不相同。他的眼中尽是人民，是活生生的人，是百姓生活的百态。至于朝廷，与他何干？有利于百姓的则鼎力协助，变法之类置百姓于不利的则极力反对，因而他才会落得个一度被贬的下场。但苏轼满不在乎，他一度求重用，不过是为了将在变法中水深火热的百姓发声而已。“当时似乎只他一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平民的负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对于苏轼任地方官，是多其中在百姓的生活如何改善上，这也与辛弃疾大为不同。

总的来说，同样是爱国，苏轼爱的是活生生的人，而辛弃疾爱的是宏大的国家。正因为他们二人，我才知道为国为民可以拆开来谈。苏轼为民，是因为百姓在流离失所中需要他的关怀；辛弃疾为国，是因为人民的意志在破碎的山河面前早已上升为国家意志。无论山河也好，黎民也罢，总结就是爱国二字。他们都早已将大宋装在了心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表现出来的是为国或为民。因而为国为民，表现不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同样是爱国，苏轼爱得潇洒，辛弃疾爱得坚定，如今自然不能妄下定论去评判谁高人一等。他们都是豪放派，豪放派之所以豪放，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就是豪迈放纵的，将天下装在胸中的人，怎会拘泥于儿女之事呢？

最后再谈谈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权当是放松，私以为东坡比稼轩幸福太多。稼轩是“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东坡则是“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虽是及时享乐，好歹也乐在其中。辛弃疾终其一生都徘徊于壮志难酬的悲愤之中，后也在郁郁不得志中离世。而苏轼则将这些一并释然，赏赏景，种种地，研究研究菜谱，品尝品尝美食，闲时亦能与弟弟子由遥寄相思，老来超脱外物而逝。如此究其本质，还是在于传统儒家思想与儒释道思想上之区别。幼安一生陷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桎梏之中，想让他释然全无可能，最多做到独善其身，用行舍藏。可就连这点，幼安都做不到。在他看来，无从报国，人生全无意义。而苏子瞻则在儒释道之思想下悠然度日，少时是可爱的小书生，长成则为潇洒的才子，与佛印、黄庭坚之属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如此一比，苏轼自幸福太多，如此一来，私心偏爱东坡自然也不为过。